

我评我论



从李娜夺冠谈体育与政治

说不说感谢和该不该感谢，本是两回事。心中的想法有人说有人不说,这都很正常,抓住李娜说没说这句话大做文章,是不是太阴险毒辣了？

■宋公明

中国职业女子网球选手李娜夺了法网冠军,本来是件好事,中国人都应当感到自豪和高兴。然而却有人像讨人嫌的苍蝇一样,偏要见缝下蛆,说什么李娜夺冠后没说感谢党和国家,说明她的成功应当归功于脱离了体制;是体育走职业化商业化道路和个人奋斗的结果,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论的胜利,根本就不必感谢国家。

李娜夺冠后,没有说感谢国家之类的话,并不

代表她心中就没有祖国。当国旗在国歌声中升起时,李娜是代表着中国站在领奖台上的。你不是她肚里的蛔虫,怎么知道她内心就没有对国家的感激之情?放在嘴上说什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心里未必真的有国家存在。但是运动员在获胜后说“感谢党、感谢国家”,也不一定就是十足的虚伪而不是真情的流露。说不说感谢和该不该感谢,本是两回事。心中的想法有人说有人不说,这都很正常,抓住李娜说没说这句话大做文章,是不是太阴险毒辣了？

旧中国的体育界是什么状态,就不用多说了,不是没资格参加,就是抱零蛋回家,人家根本就不和你“东亚病夫”玩。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乒乓球队自从容国团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5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最近又一次包揽世锦赛全部5项冠军。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还不能

说明问题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第一,也不能说明问题吗?仅仅出了个李娜,就能证明运动员只有脱离体制才有出路?

现代社会,体育不可避免要服从政治,而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要影响体育甚至运动员的个人命运。在世界竞技场上,运动员都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夺得冠军,要升国旗、奏国歌或升区旗、奏区歌。这是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长远竞争和较量。而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足以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体育运动中同样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无论是谁,能登上金字塔的顶端,都是因为其脚下有庞大的基础,只不过基础的材料有所不同而已。没有国家提供的机遇和平台,李娜能有今天吗?如果李娜的成功证明了市场化的正确,那么中国足球走市场化道路的结果,又证明了什么?在不同的制度下,都可以出人才、出成绩。问题是为了什么目的,通过什么途径来出人才、出成绩。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少数人的需要,用金钱、用牺牲运动员的健康和前途、用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用锦标主义和经济刺激、用兴奋剂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岂不是离开了体育的本质,又有何进步意义呢?

百家微博

人人都应公事公办

■柔情判官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公事公办的因素,或者这就是熟人社会的遗毒,因为老百姓都想从熟人关系中为自己获得便利,以求在“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中获得“公平”,结果往往是破坏了既存的规则,更不利于自己。

加强群众监督

■湖北阳光

司法环节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抑恶扬善,还是抑善扬恶,法官的裁决很关键。从过往的案例来看,许多不公正的判决,就是从办案神秘化衍生出来的。可见,促进司法公正,除了司法独立,还需有真正透明的群众监督。因此,“直播审判”如果制度化,也算是司法公开的一个进步。

建立“难事档案”

■陈飞

农村无小事。通过建立“难事档案”,时刻提醒党员干部要把老百姓的每件事都当大事办,不能敷衍、推脱。

让人看得见的公正

■日月寒镜

很多案件诉讼程序合法、实体结论公正,但仅仅因为执法者态度粗暴,引发当事人不满,甚至对案件裁决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走上上访道路。所以,仅仅严格执法还不够,还得文明执法。正所谓仅仅公正还不够,还得是“让人看得见的公正”。

我的“无压力”高考

■李保唐

我于1963年参加高考。报志愿,从北京,到省城,再到地区,每一级都有;甚至考不上的准备都有。思想上没有任何压力,因为老妈说啦:“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反正咱家没劳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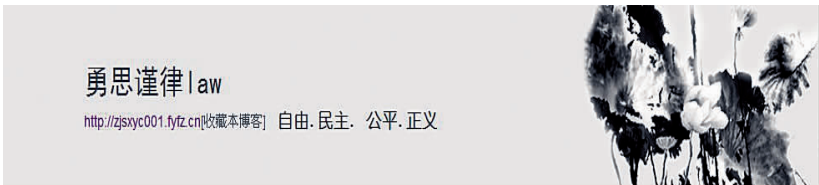
“会来事”与“会做事”

■叶塞尼亚

在现代语境里,“会来事”即是精于看前后左右关系尤其是看上司脸色行事,善为己谋。“会做事”就是会干工作,体现的是履职尽责水平,这样的人一般都是素质高、能力强或业务好、技能精的人才。显然,事业兴旺发达,需要的是“会做事”而不是“会来事”的干部。要让“会做事”的干部脱颖而出,“会来事”的干部没有市场。



反腐心得



法律不相信贪官矫情

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违纪行为,决不是陈淑英的首创发明,甚至比她级别更高的贪腐者也会有同样拙劣的表演。

■古风听竹

安徽省固镇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陈淑英因犯受贿罪,日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根据法院判决认定,陈淑英先后9次共收受行贿人现金9.5万元、购物卡计1万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万余元。然而,面对检察官的讯问,陈淑英大言不惭,声称直到被审查时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受贿,并且感到很后悔,请求组织从宽处理。

陈淑英在担任固镇县石湖乡党委书记期间,该县农民邹某、杜某与石湖乡政府签订开发原乡供销社闲置土地建农贸大市场的协议。后邹、杜二人建成商品房115间并对外出售。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陈淑英明知邹、杜所建房屋为商品房,却帮助他们顺利办理了自建房产证。邹、杜二人感谢陈淑英的“关照”,多次送给她现金、购物卡等。从乡党委书记升任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转任副县长,陈淑英居然连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请托人财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性质都没有搞明白,要么说

明她是一个真法盲,要么就是在故意掩饰自己的真实认知。

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违纪行为,决不是陈淑英的首创发明,甚至比她级别更高的贪腐者也会有同样拙劣的表演。在腐败丑行东窗事发后,一些人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追悔莫及、痛心疾首的可怜相,并且口口声声表示所作所为违反了党纪、败坏了党风和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但其实是在为自己失去了昔日的体面风光



和自由自在而悲恸哭泣。因此,腐败分子声泪俱下的忏悔不一定是真实的思想流露,装作洗心革面无非是想获得宽容和同情。

退一步讲,如果陈淑英们确实一个个都是法盲,那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可以这么认为,在现代社会,法盲远比文盲更加可怕,因为前者往往用野蛮来祸害社会,而后者只因愚昧而束缚自我。尤其是当公权力被一些法盲控制后,就必然会演化成为独断专行的乱政暴政,权力私有化的结果势必造成权钱交易乱象丛生。陈淑英们振振有词地以自己不懂法作百般狡辩,除了妄图为自己开脱罪责以外,倒更像是对某些地方干部队伍选拔管理现状的讥笑讽刺。

一个堂堂县处级官员都分不清是非罪恶,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换取一己私利还不知道是受贿,足见当下一些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已被彻底虚无。而陈淑英的“无知”之所以可以被视为笑料,是因为实际上她是知道邹、杜二人送的钱很“烫手”,从起先推辞了几次到后来索性就来者不拒,说明最终还是被侥幸心理替代了思想防线。因而,无论贪官们在案发后如何矫情,法律也决不会轻易相信罪恶苍白无力的辩解。